

徽州人在芜湖——以 1950 年代芜湖市总工会资料为中心

李甜¹

【摘要】:芜湖作为徽商的重要活动地,历史上与徽州的人员及物资交流十分频繁。1949年前后,旅芜徽商和徽州人的生活发生了变动。首先,从他们的职业选择和行业结构,可以观察到近现代徽商对芜湖各产业的全面渗透。其次,徽州人的职业介绍方式,由依靠血缘、地缘关系互相援引的传统,过渡为政府介绍、单位分配的方式。在社会流动上出现“两降一升”,部分中层职员跌入小商贩之列,徽商家庭妇女因生活压力外出务工,而徽州籍革命干部的社会流动趋于向上。社会主义改造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确立,加速推动旅外徽商及徽州人的土著化,传统的籍贯观念被彻底斩断,徽商群体也消失无形。

【关键词】:徽州;芜湖;徽商;小商贩;社会生活;职业选择;社会流动

【中图分类号】:K29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7)06-0032-09

一、学术史回顾与资料简介

徽州作为明清区域社会研究的范本,明清时期的徽商及徽州人群一直是徽学界关注的重点。与此对比,清末以降徽州资料的发掘和利用稍显迟缓,直到近年来随着研究时段的下移与学科视野之拓展,20世纪前期的徽商及徽州人群才逐渐引起学界的兴趣。众所周知,自19世纪中叶以后,盐业、典业等徽商传统优势行业一蹶不振,茶业经营则蒸蒸日上,至民国时期仍有众多茶商鏖战商界,因此,近代徽州茶商也较早引起学界的关注^①。此外,随着徽学研究从社会经济史拓展至社会文化史层面,围绕近代徽商及徽州人的同乡组织、宗族建设、社会生活等层面,亦出现了一批有深度的研究成果^②。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不再

¹**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5CZS053);2016年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147、14ZDB034)

作者简介:李甜,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上海200433)。

^①[日]重田德:《清代徽州商人之一面》,刘焱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88年,第417~456页;吴仁安、唐力行:《明清徽州茶商述论》,《安徽史学》1985年第3期;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5~664页;张朝胜:《民国时期的旅沪徽州茶商——兼谈徽商衰落问题》,《安徽史学》1996年第2期;周晓光、周语玲:《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与徽州茶商之兴衰》,《江海学刊》1998年第6期;王振忠:《清代徽州与广东的商路及商业——歙县茶商抄本〈万里云程〉研究》,《历史地理》第17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7~315页;邹怡:《产业集聚与城市区位巩固:徽州茶务都会屯溪发展史(1577—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6期,2009年;刘芳正:《民国时期上海徽州茶商与社会变迁》,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周筱华、程秉国:《民国时期徽商与茶叶对外贸易》,《黄山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蔡玲存:《徽商的近代发展与式微——以其在上海的活动为例》,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②王振忠:《徽州商业文化的一个侧面——反映民国时期上海徽州学徒生活的十封书信》,《复旦学报》1999年第4期;王振忠:《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446~486页、499~519页;沈树永:《徽宁同乡会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冯剑辉:《近代徽商研究》,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陈加林:《百年徽商与社会变迁:以苏州汪氏家族为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唐力行:《延续与断裂:徽州乡村的超稳定结构与社会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徐松如:《都市文化视野下的旅沪徽州人(1843—195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张小坡:《同学会:近代旅外徽州青年学子的群体组织及其运作》,《安徽史学》2017年第4期。

被视为分水岭，徽商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生存之变，也初步受到注意^④。

皖南地区具有悠久的商业文化传统，1949 年发生天翻地覆的政治变革，使得无论是本土社会还是旅外商帮，生存环境皆发生巨大变化。不过，基于传统的惯性，商业文化的影响仍然不绝如缕。学界此前受制于文献发掘与使用，较少涉及徽商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这一时期的小商小贩之日常生活与商业经营也关注不多^⑤。由此，学界对皖南商帮的转折、衰微过程，无论是从整体还是细节上皆缺乏讨论。近年来资料收集手段的丰富和发掘力度之提升，使得我们有条件观察近现代徽商及徽州人在经营、生活、交际、观念等方面发生的变化，这将有助于加深对 1949 年前后的商人群体生存变迁和皖南区域社会转型之理解。

新发掘的安徽省芜湖市总工会文书资料，数量计 500 多册，时间跨度从 1949 年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其中除了大量的日常运作记录，还有 87 本工会会员登记册，由数百份各行业会员登记表组成，包括会员个人简历、家庭状况、工作以来的职业及变动、所属行业等细节^⑥。1949 年 7 月成立的芜湖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由歙县人郑家琪等 7 人组成，会址设在柳春园 21 号，经过一年的组织发动，芜湖市总工会于 1950 年 11 月 15 日正式成立^⑦。据 1951 年统计，芜湖市总工会依托于高效的组织能力，成立仅一年就发展出 23171 名会员，其中包括 39 名委员以及 36 名脱产干部，约占芜湖市职工总数 28132 人的 82%^⑧。截止于 1950 年底，芜湖市的总户数为 48471 户，人口数为 290548 人^⑨。两相比照，大致可推定职工数占芜湖全市总人口的 9.7%，工会会员占全市总人口的 8%左右。由此可见，芜湖市总工会资料的覆盖面广，工会组织在该市各行业全面建立，具备考察徽商及徽州人群体的抽样价值。笔者通览全部登记册，一共收集到 42 份徽州人的履历，根据登记内容对个人信息的回溯原则，可以掌握他们在民国年间至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个人经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工会资料保存过程中有遗失，且存在土著化后改籍的现象，实际参加工会的徽州人及其后裔肯定多于此数。本文且以 42 个案例为中心，关注旅芜徽州人的个体生活如何随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动，希望为探讨徽商的改造与消亡历程提供一个区域性的案例。

二、从徽州到芜湖

芜湖商业的发展并不是当地人从事商业活动的结果，而是借助于客籍商人的力量^⑩。近水楼台的徽商群体，在芜湖商业发展与城市建设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王廷元从总体性的角度，对明清时期徽商在芜湖的活动作了细致梳理^⑪。王振忠在讨论徽、临商帮的木材贸易时，详细勾勒了芜湖“徽临滩”的历史变迁^⑫。他还从徽商与芜湖民俗方言的角度入手，通过解读徽商倡捐创立同善堂的事例，诠释徽商的土著化^⑬。

^④王振忠：《水岚村纪事：1949 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李甜：《1955 年，旅外徽人的家信》，《徽州社会科学》2009 年第 3 期；唐力行：《徽州旅沪同乡会与社会变迁（1923—1953）》，《历史研究》2011 年第 3 期；李甜：《旧商人与新时代：赣商汪德溥的生活变迁（1890—1955）》，《安徽大学学报》2014 年第 6 期；汪柏树：《1949—1950 年屯溪当代徽商考察》，《黄山学院学报》2017 年第 1 期。

^⑤实际上，徽州文书中有不少下层徽商小贩的记录，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参见王振忠《徽州文书的再发现（下）》，王兆成主编：《历史学家茶座》2009 年第 2 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31~141 页，尤其是第 136~138 页。

^⑥这批资料馆藏于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资料标引方式如下：原始目录号—年份—名称—姓氏笔画（字母表示分册）。如“096—1951—五一年市店员工会会员登记表（7b）”表示：原始目录号为 096 的会员登记册，制作年份为 1951 年，封面名称为《五一年市店员工会会员登记表》，按姓氏笔画系会员姓氏首字母为七画的第二分册。

^⑦《芜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芜湖市志》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 年，第 285 页。

^⑧⑨114—1951—五一年市基层工会组织登记表。芜湖市总工会 1951 年 10 月 23 日填写。

^⑩《皖南行政区基层组织土地面积及人口统计表》（1950 年 12 月 11 日），皖南人民行政公署办公厅编印：《皖南政报》第二卷第一期，插页，1951 年 1 月。

^⑪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第 109 页。

^⑫王廷元：《论明清时期的徽商与芜湖》，《安徽史学》1984 年第 4 期；收入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第 108~120 页。

^⑬王振忠：《徽、临商帮与清水江的木材贸易及其相关问题——清代佚名商编路程抄本之整理与研究》，《历史地理》第 29 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收入《社会历史与人文地理：王振忠自选集》，上海：中西书局，2017 年，第 159~197 页，尤其是第 193~196 页。

^⑭王振忠：《同善堂规则章程——介绍徽商与芜湖的一份史料》，《安徽大学学报》1999 年第 4 期。

众所周知，交通与移民、商业乃至文化格局密切相关，明清时期诸多商路书均提及皖南地区的交通路线^⑭。经行芜湖的道路主要有几条：仪真〔征〕县由宁国府至徽州府水陆路、芜湖县至徽州府路^⑮，南京由芜湖至徽州府陆路、芜湖由太平县至徽州府路、芜湖由宁国府至河沥溪路^⑯，芜湖县由东霸〔坝〕至无锡县^⑰。上述道路的终点泰半为徽州，足见芜湖是徽州外出北上的重要基地。早在明代，芜湖就是徽商的重要活动地。万历《歙志》记载各大都会时，将芜湖、仪真〔征〕视为“诸县”的典型予以提及^⑱。至于在芜湖开染坊的歙县人阮弼，更是屡屡为学界所引用^⑲。明清时期大量徽商在外地经商，不少人落籍定居，完成了从祖籍地缘向新的社会圈的转移^⑳。在康熙《徽州府志》列出的 11 个落籍地中，芜湖就与苏、杭等大都市相提并论^㉑。上述事例，都从一些侧面证实了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毗邻的宁国商人与徽商在芜湖发生了互动，如宁国商人方启在明末清初经营于芜湖，康熙年间有帮助落难徽商之举^㉒，方家住在芜湖徽州会馆建设中出手相助^㉓。

太平天国战乱结束后，皖南地区的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光绪二年(1876)中英《烟台条约》规定：“随由中国议准在于湖北宜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广东北海四处添开通商口岸，作为领事官驻扎处所。”^㉔芜湖是长江下游重要的物资中转地和集散地，开埠进一步确定它作为皖南区域中心城市地位，商业日趋繁盛，城市建设逐步向江边扩展^㉕。同治年间由徽商胡贞益创设的芜湖胡开文，以“沅记”为招牌向外扩张^㉖。安徽省档案馆收藏有一批光绪年间徽商在芜湖租房的合约，表明此时徽商在芜湖的活动频繁^㉗。民国初年，在芜湖经营纸业的商人，以旌德、泾县、太平、徽州等地的为多，其中徽帮在芜湖徽州码头开设纸号和纸坊生产色纸^㉘。据民国年间调查，芜湖市的布业店数共 58 家，“店主籍贯以宣城及徽州为多”^㉙，著名的共兴布店即由徽商开办^㉚。类似的调查表明，在芜湖经商的中小商人团体，以享地利之便的原徽州、宁国二府商人所组成的皖南商帮为主。

芜湖关的华洋贸易情况，揭开近代芜湖与徽州经济与社会交流的侧面。晚清以来，徽州地区所需鸦片有不少从芜湖进口，据 1891 年芜湖关统计，进口鸦片由“本埠及安庆府、宁国府、徽州府消费此项货物之大半”^㉛，至 1893 年徽州府从芜湖关进口了 289 担鸦片^㉜。与此不同，徽州茶叶的运输路线并未随着芜湖开埠而调整。1882 年的报告显示，茶叶出口仅 2000 多担，且

^⑭②参见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

^⑮③《一统路程图记》，转引自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276~288 页。

^⑯④《士商类要》，转引自杨正泰《明代驿站考(增订本)》，第 314~324 页。

^⑰⑤(明)黄汴：《水陆路程便览》卷 7，杨正泰点校，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年。

^⑱⑥万历《歙志》卷 20《货殖》。有关明代徽商的活动，参见松浦章《徽州海商王直与日本》，《明史研究》第 6 辑，合肥：黄山书社，1999 年。

^⑲⑦(明)汪道昆：《太函集》卷 35《明赐级阮长公传》，万历十九年(1591)刻本。

^⑳⑧〔日〕白井佐知子：《徽商及其网络》，《安徽史学》1991 年第 4 期。王振忠：《从祖籍地缘到新的社会圈——关于明清时期侨寓徽商土著化的三个问题》，《原学》第 2 辑，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年；收入《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年，第 58~74 页。

^㉑⑨康熙《徽州府志》卷 2《风俗》。

^㉒⑩(清)方表等纂修：《旌德方氏统修宗谱》卷 6《尚文坊派长二分世系》，康熙三十七年(1698)刻本。

^㉓⑪方铺总修：《隐龙方氏宗谱》卷 20《安田方翁暨周程两孺人合传》，1921 年木活字本。

^㉔⑫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年，第 349 页。

^㉕⑬杨秉德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1840—1949)》第十三章《长江沿岸的中等城市芜湖》，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 年，第 393~412 页。

^㉖⑭芜湖市工商业联合会：《芜湖胡开文墨店调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23 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170~186 页；胡毓骅：《芜湖胡开文是“源记”还是“沅记”》，《徽州社会科学》2013 年第 9 期；林欢：《徽墨胡开文研究(1765—1965)》，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 年，第 49~50 页。

^㉗⑮严桂夫、王国健：《徽州文书档案》，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288 页。

^㉘⑯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查编：《京粤京湘两线安徽段芜湖市县经济调查报告书》“商业经济篇”《各业概况·布业》，出版地点和时间不详，第 65 页；芜湖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芜湖工业百年》，合肥：黄山书社，2008 年，第 66 页。

^㉙⑰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查编：《京粤京湘两线安徽段芜湖市县经济调查报告书》，第 59 页。

^㉚⑱叶荫藩：《芜湖“共兴布店”》，黄山市徽州文化研究院编：《徽州文化研究》第 3 辑，合肥：黄山书社，2002 年，第 285~288 页。

^㉛①沈世培校注：《芜湖关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清光绪十七年芜湖关贸易情形论略(一八九一年)”，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93 页。

^㉜②沈世培校注：《芜湖关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清光绪十九年芜湖关贸易情形论略(一八九三年)”，第 107 页。

大半从宁国府太平县运来，“其大部分出产地之徽州，在地图上观之，似不甚远，但运输之困难及人民离开、已往贸易路径之不便，故本埠开放时公认为极可忧虑之事”³³。芜湖关作为后起之秀，并未从徽州茶叶市场分得一杯羹，引起管理层的忧虑。此后情形更糟，甚至“前数年所有本埠出口之茶，均直接运至上海”³⁴。芜湖茶叶市场几经周折，规模仍然不大，地方志书的记载亦可验证这一点³⁵。似乎可以这样概括两地的关系：人力资源持续从徽州流向芜湖，生产生活物资又源源不断从芜湖流向徽州。

徽州人在位于市区中心的陶塘(今镜湖)设立徽州小学，工会会员巢县人秦绍家曾在该校念书³⁶。徽州小学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后来改为柳春园小学³⁷。1937年出生的袁汉云作为徽人后裔，先在江北中路读私塾，1950—1951年转入徽州小学读书³⁸。除了徽州会馆、徽州小学等公益设施，徽州码头也是展现旅芜徽商影响力的地方，泾县人吴报1935—1938年在徽州码头河沿晋隆板料炭号工作³⁹。

省内外各地在芜湖设立20多所会馆，以徽州会馆规模为大。最早的徽州会馆建于康熙十九年，馆址在索面巷，后来徽人嫌其狭小，不足以壮观瞻，遂捐资购城西状元坊下首基地⁴⁰。值得一提的是，徽州会馆创建时曾得到宁国商人方家仕的大力协助：“徽属人之议建会馆于芜湖也，亦翁赞成之，其址邻翁业，翁让便之，而为之度划，规模制度皆出翁手。”⁴¹徽州会馆代表着徽商在芜湖的影响力，徽州会馆、新安会馆、徽国文公祠等建筑地标皆可于民国地方志书的卷首图中找到⁴²。民国元年，商定将租界部分地方让与海关填岸建房，这一重大举措的推动者，除首任安徽都督柏文蔚、海关监督，还包括“高尚之团体，如徽州同乡会及其会长鲍庚等，共同处理，凡有关于安徽大商埠之发达者，莫不促成之”⁴³，从中亦可见旅芜徽州同乡的势力。

三、旅芜徽州人的职业选择与行业结构

本节通过分析42位徽州人的个人简历来看他们的职业选择。从性别来说，女性为5人，其中烟业2人，铁厂、缝纫业、报社各1人，其余皆为男性。就籍贯而言，歙县13人，绩溪10人，黟县8人，休宁5人，屯溪4人，祁门1人，另有1人填成“徽州市”。各地人数分布大体与距离芜湖远近呈正相关，歙县、绩溪和黟县拥地利之便，皆有官道直达芜湖，故而人数较多，距离最远的婺源一县空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徽州各县对外输出人力资源的区域差异。需要指出的是，歙县人中包括一名祖籍湖北的移民后裔，而那位籍贯填成“徽州市”的人，自启蒙时期就在芜湖接受教育，推想应是土著化的徽商后裔。

接下来分析他们的职业选择及构成。从等级上说，地位最高者担任明远电厂副经理，占主体的是职员、店员或者报社编辑等职，亦不乏小商小贩。从流动性上看，一些人未曾换行，但也有人职业流动较为频繁，这里取其从业时间最长的职业或最后从事的职业为准，确定40位徽州人的职业构成(图1)。

³³③沈世培校注：《芜湖关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清光绪八年芜湖海关贸易情形论略(一八八二年)”，第44页。部分文句似不通顺，原文如此。

³⁴④沈世培校注：《芜湖关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清光绪九年芜湖口岸贸易情形论略(一八八三年)”，第49页。

³⁵⑤民国《芜湖县志》卷35《实业志·商业》。

³⁶⑥249—1960—一六零年工会会员登记表(10c)。

³⁷⑦俞正东：《外地在芜湖的会馆》，政协芜湖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芜湖文史资料》第4辑，芜湖日报社印刷厂印，1990年，第85~90页。

³⁸⑧211—1959—一五九年年市弋江钢铁厂工会会员登记表(10)。

³⁹⑨096—1951—一五一年市店员工会会员登记表(7b)。

⁴⁰⑩民国《芜湖县志》卷13《建置志·会馆》。

⁴¹⑪民国《隐龙方氏宗谱》卷20《安田方翁暨周程两孺人合传》。

⁴²⑫民国《芜湖县志》卷首《城西图》。

⁴³⑬沈世培校注：《芜湖关华洋贸易情形论略》，“民国元年芜湖关贸易情形论略(一九一二年)”，第204~20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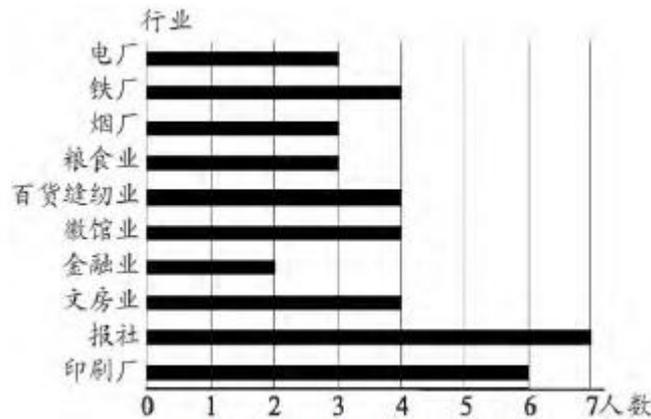


图1 各行业的从业人数统计

未计入图1的汪灶洪、汪运全二人，经历较为特殊，参见下文分析。以下对40位徽州人从事的行业作一分类整理。

(一) 实体工业

明远电厂3人。由绩溪商人吴兴周等投资增股兴建的明远电厂，1907年开工建设，次年投产发电^{④4}。始建之初，外国人即预测该厂将对芜湖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今有一极可注意之事，即为四月中，本埠装设电灯。当草拟报告时，约有四千盏，发动机之马力，已颇够用。现又另外购订机器，将来此机器到时，不仅可多装电灯，并可供给本埠制米厂机器之用。本埠现已有四家采用外洋机器之制米厂。”^{④5}芜湖市工会资料记载，学生出身的周协恭担任明远电厂副经理^{④6}。周协恭是绩溪华阳镇人，抗战胜利后接收芜湖明远电灯公司，任副董事长，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任资方经理^{④7}。工人出身的绩溪人程介屏，在明远电厂任验表室技术员。绩溪华阳镇人舒辅湘，在绩溪、徽州师范学校等地接受教育，1947年3月来芜湖明远电厂营业课工作^{④8}。

铁厂4人。1949年5月，原芜湖市保安司令部修械厂与第六专员公署修械所及安澜工业学校实习工厂合并为皖南公营芜湖铁工厂(今芜湖造船厂)，是芜湖第一个国营机械厂^{④9}。绩溪人胡明龙，20世纪30年代曾在芜湖恒升机器厂学徒三年，抗日战争中因淮南铁路被日寇侵占而失业返乡，新中国成立初担任芜湖铁工厂秘书^{④50}。绩溪人程布人，1950年来公营芜湖铁工厂工作，1951年9月至1952年4月被皖南公营工矿产销部调赴上海华东工业部通用机器厂学习铣工半年^{④51}。黟县人俞佩宜，任芜湖铁工厂的成本会计^{④52}。休宁人张一新1958年6月由地委分配到芜湖市钢铁机械砖瓦厂工作，担任炼铁车间副主任^{④53}。

烟厂3人。歙县人杨荷妹，在新中国烟厂撕烟叶。黟县人李佩瑶，在新生烟厂包装室包装香烟^{④54}。寄居歙县芝篁村的湖北移民后裔程遵荣，1942年到屯溪私营中美烟厂任采办员，1946年调至芜湖私营中美烟厂机器间，其后赴定远炉桥为上海大中烟行采办烟叶，1949年又回到芜湖中华烟厂任采办员，之后才转业到碾米行。他的社会关系一栏写到：“友人王治汉在歙县种田，

^{④4}市工商联供稿、许知为执笔：《解放前的芜湖商会》，政协芜湖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芜湖文史资料》第4辑，第28～41页；芜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芜湖市志》，上册第215页、下册230页；邵之惠：《芜湖“明远电灯股份有限公司”》，黄山市徽州文化研究院编：《徽州文化研究》第3辑，第314～320页。

^{④5}沈世培校注：《芜湖关华洋贸易情形论略》，“宣统元年芜湖关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一九〇九年)”，第190页。

^{④6}①029—1952—五二年基层工会干部登记表。

^{④7}④耿培炳：《儒商翘楚西关章》，《皖南晨刊》2017年01月23日，第X12版。

^{④8}①029—1952—五二年基层工会干部登记表。

^{④9}⑥芜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芜湖市志》上册，第66～73页。

^{④50}⑦068—1954—建筑、纺织、轻工、交通、商业基层工会干部登记表。

^{④51}①029—1952—五二年基层工会干部登记表。

^{④52}⑦068—1954—建筑、纺织、轻工、交通、商业基层工会干部登记表。

^{④53}⑩256—1961—一六一年会员登记表(8)。

^{④54}①024—1950—五零年卷烟业工会会员登记表(7)。

解放前同在烟厂做过工。”⁵⁵

(二) 加工服务业

粮食业 3 人。黟县人汪松生, 1941 年到芜湖石头路宏昌麦粉厂做职员, 1946 年底歇业后失业, 一度沦落到摆烟摊的局面⁵⁶。绩溪人高彰仪, 原在绩溪敬心米店学徒, 1949 年到西街宏裕米厂任店员⁵⁷。歙县人方树仁(方大度), 1950 年到皖南中粮公司从事人事工作, 填表时的单位是国营芜湖市第一面粉厂⁵⁸。

百货、缝纫业 4 人。歙县人潘家祯, 1948 年到芜湖久丰百货工作, 至 1951 年转入合群百货公司⁵⁹。徽州市人袁汉云, 1953 年在本市迎江街 17 号缝纫店学徒, 合作化以后分配到缝纫五社, 之后调到制鞋一社、戏具社⁶⁰。黟县人汪静珍, 1950 年先后到群里草织厂、被服厂等厂做工⁶¹。歙县人杜渊, 1940 年在屯溪缝纫生产合作社学徒, 此后到休宁五城、杭州等地被服厂就业, 新中国成立后在皖南军区被服厂工作⁶²。

徽馆业 4 人。徽馆是徽菜馆和徽面馆之总称, 文献记载相对较少⁶³。芜湖“同庆楼”菜馆距徽州小学不远, 是当地有名的酒菜馆⁶⁴。绩溪人高灶炳, 13 岁到同庆楼菜馆学徒。比他年长一岁的绩溪人高周德, 先在芜湖大庆楼学徒, 满师后至同庆楼工作⁶⁵。绩溪人汪嘉典, 先年活动于苏州、立煌、庐江等地, 此后在芜湖的安徽学院、成丰米厂做厨子, 新中国成立后在皖南行署、民政处、皖南师范学校等单位当厨工⁶⁶。歙县人徐万才是土著化的徽商后裔, 他在崇德小学、私立内思中学、芜关中学等校念书, 1948 年到新生食堂服务, 次年服务于合记菜园, 1950 年夏季又回到新生食堂任司账⁶⁷。

(三) 金融、文化业

金融业 2 人。歙县人宋棣轩生于 1899 年, “祖籍本省歙县上峰村”, 在芜湖市长街区各钱庄工作 30 多年, 职业生涯长期保持稳定, 未受战乱影响。早在 1913—1916 年就在长街区通孚钱庄习业, 1917—1927 年在长街区保泰钱庄管外账, 1928—1932 年在大源钱庄任总账房, 1933—1937 年在盛昌钱庄任副经理, 1942—1943 年在成裕钱庄当营业员, 1944—1945 年到洪福钱庄担任营业主任, 1946—1947 年芜湖陡门巷老通孚钱庄复业后前往襄理, 1948 年回到长街区的皮毛合作社信托部, 1949 年在生(?) 记钱庄任业务主任。金融业改造以后, 调到芜湖四褐山窑厂担任会计等职⁶⁸。黟县人胡德辉, 1930 年到芜湖成大钱庄当练习生, 收歇后赴九江、原籍谋生, 1940 年回到芜湖, 先在志大布店当店员, 次年 1 月进久泰钱庄工作, 一直到 1944 年初转入本市源生钱庄担任会计。在 1946 年 1 月, 他与同乡汪金辉募集资金开伟业钱庄, 任副理, 同年 10 月收歇失业。此后到福记钱庄(后改名

⁵⁵068—1954—建筑、纺织、轻工、交通、商业基层工会干部登记表。

⁵⁶①083—1950—工会会员登记表(7)。

⁵⁷②080—1950—工会会员登记表(10—11)。

⁵⁸③068—1954—建筑、纺织、轻工、交通、商业基层工会干部登记表。

⁵⁹④029—1952—五二年基层工会干部登记表。

⁶⁰⑤211—1959—五九年市弋江钢铁厂工会会员登记表(10)。

⁶¹⑥168—1952—五二年市手工业工会会员登记表(7)。

⁶²⑦060—1950—五零年手工业工会会员登记表(7)。

⁶³⑧相关研究参见王振忠《清代、民国时期江浙一带的徽馆研究——以扬州、杭州和上海为例》, 熊月之、熊秉真主编:《明清以来江南社会与文化论集》,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年, 第 128~152 页;王振忠《徽学研究入门》,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第 29 页;韩旭《明清绩溪商人研究》, 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 年, 第 24~28 页;唐艳香、褚晓琦《近代上海饭店与菜场》,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 年, 第 44~53 页。

⁶⁴⑨芜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芜湖市志》下册, 第 738 页;姜丽:《芜湖“同庆楼”菜馆》, 黄山市徽州文化研究院编:《徽州文化研究》第 3 辑, 第 255~256 页。

⁶⁵⑩020—1950—五零年市店员工会会员登记表(10)。

⁶⁶⑪083—1950—工会会员登记表(7)。

⁶⁷⑫020—1950—五零年市店员工会会员登记表(10)。

⁶⁸⑬154—1962—各基层工会会员退休申请报告表。

源成)担任会计、营业员,1949年任源成钱庄副理直到收歇,1951年改行到米厂担任会计⁶⁹。

文房业4人。屯溪人朱桐生,小学毕业后到屯溪李鼎和笔庄学徒一年,1949年来中山路76号的李鼎和笔庄服务 琦璠。歙县人方国柱,在芜湖中河沿刻字为生⁷⁰。黟县人汪金尧,13岁到东南刻字社学徒5年,在中山路39号门前摆金记刻字处⁷¹。担任芜湖市总工会筹委会主任的歙县人郑家琪,专业技术是“雕刻”⁷²。

芜湖报社7人。1956年初,国务院批准徽州专员公署和芜湖专员公署合并,仍称芜湖专员公署,驻芜湖市⁷³。同年4月1日,在原徽州报社基础上创办了《芜湖报》⁷⁴。此7人分别在不同时期加入。歙县人汪其英,1949年3月曾在上海瑞丰太茶庄当练习生半年,此后返乡务农、参加革命,1951年到徽州报社下属的新华印刷厂工作,后到芜湖报社任财务股长。祁门人胡开明,1951年从徽州师范毕业,先在祁门县政府工作,1953年调至徽州报社。歙县人汪光裕,1953年至徽州报社任美术编辑。休宁人查国英、吴仕楨,都是1955年调到报社⁷⁵。屯溪人鲍克、黟县人黄育仁,皆于1958年调到芜湖报社⁷⁶。此外,浙江昌化人陈长文1949年毕业于歙县师范学校,为当地政府留用,1953年调至徽州报社编辑部⁷⁷。

印刷厂的6人分属两个单位,与文房业中的刻字摊贩不同,他们的工作层次更高。一是芜湖报社的附属印刷厂。休宁人洪建宇1949年进徽州报社印刷厂,该厂后改为芜湖报社印刷厂屯溪分厂。歙县人汪强华,1952年至芜湖报社印刷厂屯溪分厂工作。绩溪人胡锡九,1957年分配到芜湖市印刷厂⁷⁸。另一个是新华印刷厂,该厂是全省第一家国营印刷厂,1949年组建时名为新华书店芜湖支店印刷厂,1952年改用现名⁷⁹。担任该厂工会主席的歙县人张君坚,“自小学毕业后,即学习排字,除被抓征兵外,都是做排字技工”,曾在屯溪,浙江于潜、孝丰、昌化,江苏高淳、南京等地的印刷生产合作社、出版社、印刷厂等机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新华社皖南分社、皖南日报社担任书版组长、排字组长。休宁人汪明瑞,原在屯溪中央日报社、复兴日报社工作,1949年芜湖解放接收报刊,到新华印刷厂排字车间任铸字工人。屯溪人李怀喜,抗战前就在上海联泰印刷所、同文印刷所、大光明印刷所、东方印刷所等学徒、工作,1949年到芜湖新华印刷厂当划线装订工人⁸⁰。

四、旅芜徽州人的职业介绍方式与社会流动之变迁

虽然传统的生存方式具有延续性,但1949年前后的政治变革,对旅芜徽州人的职业介绍、社会流动造成了显著影响。在职业介绍方面,传统的依靠血缘、乡缘的介绍方式,在20世纪50年代逐渐被新政权所主导的方式取代。社会流动层面的影响更为直接,1949年前后旅芜徽州人普遍出现向下的社会流动,不少徽州籍家庭妇女走出家门工作,说明徽商家庭的生活日趋艰难,与此相反,参加革命之徽州人的社会流动趋于向上。

首先,1949年后的职业介绍方式渐渐发生变化。此前徽州人找工作大多利用传统的乡缘、亲缘关系,依托于亲戚、朋友、同乡的援引推荐。歙县人潘家祯,其父亲“托友介绍”到芜湖久丰百货工作。汪金尧“由友介绍”至本市东南刻字社学徒。这一传统职业介绍方式,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绩溪人高彰仪1949年11月来芜,“因朋友之交代,谋荐本市西街宏裕米厂”担任店员。黟县人李佩瑶在“解放不久”能进新生烟厂,就是得到同乡名士叶荫藩的推荐。1952年,汪强华“由本家汪百仓同

⁶⁹ Q068—1954—建筑、纺织、轻工、交通、商业基层工会干部登记表。

⁷⁰ ①148—1951—五一年市手工业工会(度量衡、刻字印刷、香烛裱画、缝纫)会员登记表(2—5)。

⁷¹ ②151—1951—五一年市手工业工会(度量衡、刻字印刷、香烛裱画、缝纫)会员登记表(7b)。

⁷² ③187—1949—1964—四九年至六四年本机关职工工会会员登记表。

⁷³ ④《国务院关于同意将宿县和滁县2专员公署合并改设蚌埠专员公署、徽州和芜湖2专员公署合并改设芜湖专员公署给安徽省人民委员会的批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6年第8期。

⁷⁴ ⑤芜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芜湖市志》上册,第675~676页。

⁷⁵ ⑥198—1957—五七年市工会会员登记表(7—9)。

⁷⁶ ⑦201—1958—五八年市工会会员登记表(8—17)。

⁷⁷ ⑧198—1957—五七年市工会会员登记表(7—9)。

⁷⁸ ⑨198—1957—五七年市工会会员登记表(7—9)。

⁷⁹ ⑩芜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芜湖市志》下册,第120页。

⁸⁰ Q068—1954—建筑、纺织、轻工、交通、商业基层工会干部登记表。

志介绍”到印刷厂。值得一提的是，籍贯与行业有关联性。明远电厂由绩溪人投资兴办，案例中的3名电厂职工皆为绩溪籍，且沾亲带故。与此产业相关的芜湖铁工厂，亦有2人为绩溪人，其中程布人的姑父周协恭、伯父程介屏在明远电厂任职，通过他们的关系，程布人得以在1950年入厂工作，次年即获得机会到上海进修。在徽馆业中，绩溪人似乎也占据优势地位，芜湖同庆楼即由绩溪人主导。

随着新政权逐渐站稳脚跟，传统的血缘、乡缘关系逐渐受到意识形态制约，一种新的职业介绍方式开始流行。在政府发力解决就业问题的背景下，汪静珍先是得到“妇女会”的帮助，接着“由劳动局介绍”一份正式工作。胡锡九1956年由省工业厅招入芜湖工业厅训练班，毕业后分配工作。黟县人俞佩宣能在不同政府部门之间调动，可能与其文化程度较高及丈夫是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有关。1958年大炼钢铁的政治形势下，不少徽州人应召转业，张一新即由地委分配来芜湖市钢铁机械砖瓦厂，与他经历相似的还有临时抽调至弋江钢铁厂的袁汉云。在行政区划调整后，芜湖报社、印刷厂集中了不少徽州人，这显然也突破了传统的职业介绍方式。其次，由于抗战以来社会大环境恶化，国民经济长期不振，旅芜徽州人中出现两种向下的社会流动。

一是原来位居中层的部分商业职员，失业后跌入小商小贩的行列。汪松生1941年到宏昌麦粉厂做职员，该厂歇业后被迫在新市口摆摊三年，至1949年到协新五洋店当职员，年底歇业后又去摆摊，1951年初在家中卷手工烟，一直找不到更好的职业出路。胡德辉的经历也颇为坎坷，他在钱庄业断断续续工作了十多年，1946年与同乡汪金辉募集资金开伟业钱庄，结果不到10个月就收歇失业。他在商业领域的扩张与顿挫，与旅赣徽商汪德溥的经历颇为相似⁸¹。1946年仍以开钱庄为生财之道，也足见近代中小徽商的商业意识之差，这种完全跟不上形势的投资经营策略，或许也是徽商加速衰落的原因⁸²。

二是徽州女工增多，原来一些婚后只从事家务的徽州女性，由于产业衰败导致的经济恶化，重新面临就业的压力。以3位女工为例，社会变动终结固有的生活轨迹，日常生活困难，迫使她们出来工作。歙县人杨荷妹自幼随父母生活，13岁学习家务，19岁结婚，婚后6年的1950年，丢掉家务到中国烟厂从事技术含量不高的撕烟叶工作。黟县人李佩瑶出身徽商家庭，6岁时在安庆读书，后随家庭迁移到南京、杭州，抗战时返乡，“求学未间断，直到小学毕业为止，此后生活不安定，家庭入不敷出”，开始帮助家庭从事劳动生产，种地种菜，勉强度过抗战的艰难阶段。1948年来芜湖，在家助理家务，“几次谋事不成”，解放不久到新生烟厂工作以补贴家用。黟县人汪静珍，在私塾、县立碧阳学校念过书，就回家学做绣花、打毛绳衣服。1940—1945年在黟县胡永兴蚊香厂、仰记烟店学徒、工作，可见女学徒已不罕见。她自1946年结婚后，随迁宁国、芜湖、当涂等地，“这时候是做做家务的事情”，1950年再度出门找工作，在本市群草织厂、被服厂做工。

与上述两种向下的社会流动相反，有一个特殊群体——徽州籍革命干部的社会流动呈现向上的轨迹。芜湖甫一解放，歙县人郑家琪就参加市总工会的筹建，担任筹委会主任，全面负责组织建设与成员发展，后来还担任芜湖地委第二书记等职⁸³。休宁人张一新，曾在屯溪沅兴和酒坊、万安益沅酒坊做学徒、店员，1952年到休宁县供销社古城加工油坊当业务员，同年9月任万安镇镇长，仕途升迁较快，1958年由地委从休宁调到芜湖。绩溪人胡明龙，日寇侵略失业返乡后参加皖南游击队，此后脱产参加革命工作，担任区秘书。歙县人汪强华，1951年4月入伍，次年4月就地转业。歙县人方树仁原系松江同大茶叶店学徒，到上海等地跑过小生意，1945年入国民党军，1946年在苏北被俘后参加华东野战军，1948年山东莱芜战斗受伤住院，1950年退伍后到皖南中粮公司从事人事工作，1951年负责中粮太平办事处。上一节对各行业的从业人数统计分析中，有二位干部的职业构成难以确定。屯溪人汪灶鸿(汪灶洪)1953年前一直在徽州学徒、工作，进入政府部门后担任安徽省公路局徽州公路段保卫干事，后调芜湖公路段工作⁸⁴。黟县人汪运全的经历颇为复杂，他原在江苏小学(今花津桥)读书⁸⁵，1937年逃难至铜陵、繁昌等地种地，1943年经乡长介绍到无为县新四军临江办事处总队部警卫连，1944年日军扫荡被俘后释放，1945年在鑫鑫地下钱庄

⁸¹①李甜：《旧商人与新时代：赣商汪德溥的生活变迁(1890—1955)》，《安徽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⁸²②关于新中国成立前后金融机构的起伏，参见芜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芜湖市志》下册，第911~912页。

⁸³③芜湖市档案馆编：《芜湖市隶属关系与行政区划文件汇编(1949—1992)》，自印本，1993年，第67页。

⁸⁴④198—1957—五七七年市工会会员登记表(7—9)。

⁸⁵⑤芜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芜湖市志》下册，第642页。

当职员，此后与人合股做单帮生意，1950年至校产整理委员会工作⁸⁶。

女性也是革命干部的重要组成部分。黟县人黄育仁，原在本县机关任职，1958年调到芜湖。黟县人俞佩宣的家庭成分是“经商”，分别在黟县蔚文小学、屯溪徽女中、黟县复旦附中、立煌安徽学院等校读书，解放后参加干校学习，先后进文工团、卫生局、工业厅等单位，调上海学习一年多后，返回芜湖铁工厂任成本会计。

五、结论

通览上述 42 个案例，虽不能涵盖旅芜徽商及徽州人生存变迁的全景，亦可概括出一些群体特征。

首先，从徽商及徽州人的职业选择和行业结构，可以观察到近现代徽商对芜湖各产业的全面渗透。众所周知，传统徽商在茶、木、粮、典和棉布业中的经营活动声势浩大，但在 19 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变迁中，徽商有衰落趋势。于是，一些以往不太涉及的行业及小本经营之事，对徽州人开始具有吸引力。在芜湖市总工会的成员中，徽州人就涉及诸多产业。其中一些行业的案例对进一步认识近代徽商不无帮助，如本文提供的同庆楼个案丰富了对徽菜馆学徒和职员生存实况的理解，明远电厂的兴衰对于理解传统商帮的现代转型及其历程有所助益。

其次，徽商及徽州人的职业介绍方式和社会流动之变迁，存在一个较明显的时间断面。旅芜徽州人的职业介绍方式，由依靠血缘、地缘关系互相援引的传统方式，1949 年以后逐渐过渡为政府介绍、单位分配的方式。在社会流动方面，1949 年前后旅芜徽州人中出现“两降一升”的社会流动，主要表现为：部分中层职员跌入小商小贩的行列，徽商家庭妇女因生活压力而外出务工，而徽州籍革命干部的社会流动呈现向上的轨迹。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职业选择还存在行业差异。一方面，手工业、金融业等传统行业的部分人群频繁地换行、换店，因为这些行业竞争力不高，业务起伏较大，容易导致失业；另一些行业的情况不同，像明远电厂、芜湖报社、印刷厂等专业性强的新兴行业，人员流动性不高，职工队伍相对稳定。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生政权尚未对旧商人开展社会改造。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和社会危机，政府甚至出台一些鼓励政策，如《安徽省摊贩管理暂行办法》在管理与指导摊贩规范经营方面就下足了工夫⁸⁷。劳动局等政府部门在解决徽商家庭的就业问题上有过实际行动，虽然杯水车薪，毕竟对徽商群体的生存过渡提供了一定的政策保障。不过，在随后的时代洪流裹挟下，旧商人很快就被新体制消化。20 世纪 50 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确立，加速推动旅外徽商及徽州人的土著化进程，传统的籍贯观念也被彻底斩断，于是作为特殊群体的徽商消失无形，他们的经历变成各种登记表中的“家庭出身”“个人成分”等政治标签。

作为普通职员、工人、基层干部、小商小贩等旅芜徽州籍小人物，与传统意义上的大商人固然有所差异，但他们在时代洪流中随波逐流或逆流而动的故事，可以为探讨徽商的改造与消亡历程提供一个区域性的案例。

⁸⁶③083—1950—工会会员登记表(7)。

⁸⁷④《安徽省摊贩管理暂行办法》，《安徽政报》1953 年第 4 期。